

金华山的投龙

这个仪式还与双龙洞的得名有关

高旭彬

投龙，原是法国汉学家沙畹的一本书的名字。

投龙，是浙江省博物馆一场跨年大展(2024年12月1日—2025年3月2日)，眼下还在热烈地进行中，展览中的文化、文物、历史、现象引起广泛的讨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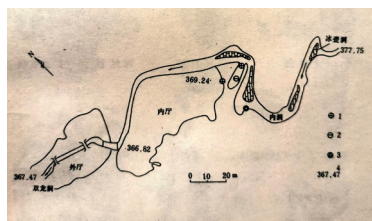
投龙，是一种古老的道教祈福仪式，它发端于秦汉时期和自然崇拜有关的山川祭祀，兴盛于唐宋，几乎每处名山大川都有。金华山，也不例外。



1987年双龙洞出土的“小青龙”



1987年双龙洞出土的玉璧



《金华山旅游地理》资料

按晚唐著名道教人物杜光庭的整理，标准的投龙仪式如下：先设坛做醮，明确此次仪轨的目的，再把相关信息刊刻在一片金或银的筒上，与金龙、玉璧、金钮、青丝等物一起投进山洞或者水府，祷告上苍或者神灵，以达到消灾祈福的目的。

在这个活动中，筒相当于一封信或者报告；龙，是信使；玉璧，是信物；金钮，代指献血之意；青丝，指割发；皆起盟誓的作用。总而言之，是与上苍或者神灵的约定。

投龙的地方是有选择的，一般来说，它必须是道教的三十六洞天、七十二福地之一。

洞天福地，也是由杜光庭他们整理和确立起来的。杜光庭，还有他之前的司马承祯，曾长期在天台山修道，所以在他们的“道教世界观”中就把我们浙江的很多山岳都列进去了。金华山，属于道教的第三十六洞天。

江苏句容《茅山志》引《宋会要》语：“诸遣使投龙筒处，建道场三昼夜，设醮一百二十分。若遣使或差官，致祭设斋醮所须之物，并检举及时办集，若使人过有须索差扰，随处具奏。江南道名山：衡、庐、茅、蒋、天目、天台、会稽、四明、括苍、缙云、金华、大庾、武夷。唐地志亦云。”

说明在早期，金华山就在官方指定的名单上。

根据此次大展的策展人魏巍的研究，浙江省内的投龙活动，以五代吴越与两宋期间居多，这跟吴越这个地方政权在政治上的长期稳定性有关。在北方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如走马灯般不断变换的同时，我们这一带保持70多年的安定局面。

吴越国的投龙很有规律，每年都分春秋两季进行。内容不外是祈求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当然，也会有某个很具体的事件。比如在绍兴的一个投龙地——若耶溪“射的潭”，就曾经出土过一片首任吴越王钱镠的筒，上面的文字除“风雨顺时，军民乐业”外，还有“寿龄延远，眼目光明”。那一年的钱镠77岁，很有可能患了白内障。

“未及丈，则至内洞矣。豁然高敞，广大颇类外洞。上下四旁，飞崖流乳，皆如涌涛积雪。罗列怪状，伫玩间若身在琼楼玉阙中。”

“行五六丈渐高，复入一门。其上穹然如华盖，名为钟楼，中悬石钟甚逼。像下有石狮子踞而坐。过丈许，乃为一龙潭，水尤清泚。宋□□中，贵人投龙于此，岁早祷辄应。由潭而上，道狭不可穷。土人曰：盖通四明、天台、洞庭诸山。”



吴越国时期投龙地

洞进行疏浚，为两洞的打通与连接做准备。就在这个工程施工中，出土一枚青铜小龙与两块玉璧，表明这里确实是一处投龙地。

不过，这枚“小青龙”，是否就是元祐六年龙却值得商榷。因为它明显带有五代或者宋早期的风格，身子较直，四足落地，是一种“走龙”，虽然背部有鳍，体现出一种年代较晚的特征，但还是不像宋代那种身体起伏较大的标准“飞龙”，究竟是何时的，还有待专家进一步论证。

另外，根据文献资料，哲宗之前的仁宗时，曾经因为“险远穷僻，难遣送醮祭之具”，将全国投龙地精简为20处，金华山已不在帝王投龙筒的范围之内。元祐六年这次的祈雨仪式上如果有投龙，应该是地方上自己进行的。

第二次，在理宗嘉熙年间。见于南宋赤松宫道士倪守约所著《赤松山志》。

《洞天福地志》云：郡人皇氏于此学道，凡投龙筒必至焉。理宗嘉熙间，祈雨告盟于此，宫中有御醮青祠碑可考。

根据他的记载，投龙地也在双龙的内洞。

“祈雨告盟”，是指向上天祈求子嗣的盟誓活动。宋代最后几个帝王子嗣都很堪忧，理宗自己就是以远宗室的身份入承大统的，此前他们这一支早就已经流落民间。嘉熙年间，自公元1237年始，此时他已三十好几，还是没有儿子。于是就在境内的道教观中纷纷设斋醮。

同样的记载也见于《茅山志》，茅山在道教上的地位可比金华山大多了。其中的“诰副墨”篇中记有嘉熙元年的一则简文，里面提到：“伏以元储虚位，未兆熊梦之祥”“愿垂覆焘之仁，弘赐扶持之力，得男而应震索”。想来金华山也应该一样的。

这个筒的实物，近年来在茅山道院重建的工程中有出土，两相对照，文字大同小异。

那么，当年都有哪些人参加了这个仪式呢？《赤松山志》中居然也有蛛丝马迹可寻，里面记录了这样一个道士。

朱知常，宋理宗时金华高道，他曾蒙同为金华人的名臣马光祖推荐，在茅山掌管过玉晨观与崇禧万寿宫，在杭州驻过佑圣观，都是当时有名的官观。景定四年(1263)，因为理宗的信任，御笔钦定为道教茅山上清派第41任嗣教宗师。不过，也许因为他并非茅山出身，这一任命受到其他茅山道士的抗议，在当时还闹出了不小的风波。

考朱知常去茅山的时间在嘉熙之后的宝祐年间，在这之前，他一直在金华山的赤松宫，所以他很有可能就是嘉熙年间金华山投龙的主事者之一，声望与资历就是在这里积累的。

另外，还有一个叫吴养浩的，曾“积阶至左街道录”，也活跃于这一时期，与朱知常孰轻孰重未可知。

事实上，元祐六年时的金华山道士，在《赤松山志》中也有影子。他们是董惟滋、黄彦达、盛旷等，根据他们的年龄与生平推算，在当初那场三洞命名的大醮中，很可能都是在场者。其中董惟滋尤可注意，因为他曾受宋神宗知遇之恩，在东京掌管过中太乙官，正是在元祐年间时回到金华的。

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去调查、研究，历史总是会揭开她的面纱，慢慢地以真容示人的。

陪同丰子恺游双龙洞的金华干部找到了

斯人已逝 情牵两代人

记者 孙媛媛

“看到这条新闻，我一整个晚上睡不着觉，从没见过父亲这么年轻的照片，内心很激动……”72岁的杨方建捧着《金华日报》动情地对记者说，这份报纸他要好好珍藏。

本报1月14日8版刊发《丰子恺一九六二年的金华往事寻找知情人》一文。数张珍贵的老照片首次通过媒体发布，展现了一段1962年丰子恺携妻子和幼女丰一吟游览金华山的往事。可惜，这段往事由于历史原因并未留下具体文字记录，本报由此发起“寻人启事”，寻找当年的知情人讲述“中国现代漫画的鼻祖”丰子恺游览金华山的故事。

报道刊发不久，读者李建华向记者提供相关线索：在丰子恺一家与金华当地陪同干部的合影中，他认出了最右边的干部是时任金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子白。李建华说，杨子白已故，自己与杨子白的儿子杨方建是同学，所以认得他的父亲。

在李建华的牵线下，记者联系上了杨方建，在约定好见面采访时间后，他拜托记者多带几份那天的报纸，“我们兄弟姐妹都想要收藏”。



与丰子恺的合影中，站在右一的就是杨子白

杨子白老照片

丰子恺赠扇面以表感谢

杨方建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，记者见到他时，他正在金东区多湖街道顺丰速运公司为快递小哥写春联。从老照片上看，杨方建与父亲长得挺像。接过记者手中的报纸，他仔仔细细地端详起那张60多年前的合影，就此打开了尘封多年的记忆。

1962年，杨方建9岁，他从小就知道父亲曾接待过丰子恺，陪同他们游览双龙洞景区。“作为地委宣传部干部，接待来金的文化界人士是父亲的工作之一。当时他回家并没有细说，工作上的事他很少说给家人听。”直至杨方建十六七岁时，才从父亲口中得知相关的细节。

那时，杨方建爱上了书法，特别崇拜文人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与父亲聊起丰子恺。杨子白当时已退休，他不无骄傲地说：“丰子恺来金华，是我陪同他到双龙洞参观。老先生留着长胡子，很健谈。”接触下来，杨子白觉得丰子恺“知书达理，待人接物也非常有礼”，完全没有大师的架子，说话做事都平易近人。

杨子白还用“懂得感恩”来形容丰子恺，这背后有一段佳话。丰子恺离开金华回上海后一个月，杨子白收到他寄来的一把扇面。“那是丰先生回上海后特意画了寄给我父亲表示感谢的。”杨方建对这把扇面印象极为深刻，扇面上画的是杭州西湖的景色。“扇面是白底的，墨汁勾勒线条，杨柳还是绿色的，寥寥数笔尽显灵动，非常好看。”杨方建回忆，父亲曾告诉他，画上有两个孩子，很有可能就是杨方建和他的姐姐，丰先生把自己对杨子白一家的感谢和祝福画进了扇面，意蕴深长。

“父亲将这把扇面珍藏在一个带锁的抽屉里，后来由我哥哥带到杭州保存。”杨方建说，父亲一直念叨着要寄些金华特产给丰先生作为回礼，至于后来是否有寄出，他不得而知。

“这是工作票，小孩子不能享受”

在与丰子恺一家的合影中，杨子白穿着一件白色中山装，看上去有些陈旧但穿戴整洁，仪表堂堂。“这件衣服我太熟悉了，一眼就能认出来，那是爸爸最好的一件衣服。爸爸很节俭，直到过世前还在穿这件衣服……”杨方建哽咽了，他说，这件中山装爸爸穿了20多年，原本是灰色的，每次遇到重要场合父亲就会穿上，并且把每一颗扣子都整整齐齐地扣好。

接待丰子恺那年，杨子白52岁，从照片上看，比实际年龄要年轻。杨子白是一名山东南下干部，1949年随军到金华，曾任建德县长，后担任金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，退休前是金华地委统战部副部长。

在杨方建的印象里，父亲一生艰苦朴素、公私分明。有一次，他在一个周末忙里偷闲带孩子去双龙洞游玩。到了饭店，他们来到地委接待处双龙招待所食堂，点了两菜一汤。杨子白看着几个孩子狼吞虎咽地吃完后，才把剩下的饭菜夹到自己碗里吃起来。

饭后，杨子白询问食堂管理员餐费是多少。管理员说：“杨部长，算了吧，就一顿便饭。”杨子白摇摇头：“公是公，私是私，我带孩子来吃饭自然要付钱。”他口袋里掏出饭钱放在桌子上，硬要管理员收下。还有一次，因部里晚上要开会，杨子白不能前往剧

院看戏，两张戏剧观摩票眼看着要作废了。杨方建提出想和姐姐一起去看戏，被杨子白严厉拒绝：“这戏票是给我们去观摩的，是工作票，小孩子不能享受！”

杨方建的弟弟杨方亮是一名老公安，退休后又义务干了近10年的反诈工作。他说：“从小父亲对我们严格要求，一直叮嘱我们要学好本领报效祖国。他言传身教，对我们影响深远。”

晚年杨子白身患胰腺癌，他拒绝了一切离休干部可以享受的公车、绿色通道等特殊待遇，坚持让儿子骑自行车送自己去医院排队挂号。1985年，杨子白去世，享年75岁。

父母百年后，杨方建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一张父母于1950年在建德拍摄的结婚照，两人都穿着简朴的军装。他拿着照片到照相馆翻拍放大，意外地发现父亲的裤子上有个很明显的破洞。“身为县长，在拍结婚照的重要时刻，爸爸竟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。”杨方建心头一阵酸楚，他拜托照相馆工作人员对照片进行处理，补上了这个洞，还父亲一条“新裤子”。

期待与丰子恺后人再续情缘

父亲已经离开40个年头，但他对自己的谆谆教导，杨方建一直铭记于心：“我在书法上能取得今天的成就，和父亲以及丰子恺先生的影响密不可分。”

得知年少的杨方建热爱书画，杨子白曾用丰子恺的事例教导儿子。“父亲说，丰先生有如此高的艺术成就，是一辈子努力的结果，他要我不畏困苦辛劳，好好学习，坚持心中所爱。”杨方建谨遵父亲教诲，不论是年轻时下放农村干农活还是后来步入工作岗位，都坚持练习书法。他曾遍访省内书法名家，现场观摩大师创作，以提升自己的艺术造诣。其间，他有好几次与丰子恺的绘画“偶遇”，每每此时，他都会想到往事。

有一次，杨方建到绍兴拜访老书法家沈定庵先生，意外看到他家墙壁上挂着一幅丰子恺的画作，画面简约明快，人物虽没有五官却颇为传神。杨方建忍不住问道：“沈老师，这幅是丰先生送您的吗？”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他对沈定庵讲起扇面的故事……

杨方建的书画好友听了他们家和丰子恺有这样一段情缘，正巧这位画家很欣赏杨方建的隶书书法，他就痛割爱将自己收藏的丰子恺画作送给杨方建，并请杨方建给他写了数套书法作品以作收藏。

60多年前，丰子恺的一次金华行，牵出两代人的情缘。杨方建说，他以前看新闻得知丰一吟曾多次回金华和汤溪参与社会活动，但苦于无人引荐，他一直没有见到，“我特别想和丰先生的后人见面，延续上一辈的情谊”。(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除署名外)



杨方建和他收藏的丰子恺 (孙媛媛摄)



上世纪70年代的全家福，前排居中者为杨子白，后排左二为杨方建